



悖离与回归

——晚明士人

美学态度的现代观照

张维昭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悖离与回归

晚明士人

美学态度的现代观照

张维昭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悖离与回归：晚明士人美学态度的现代观照/张维昭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7

ISBN 978-7-80729-442-9

I. 悖… II. 张… III. 美学史—研究—中国—明代
IV. 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5539 号

书 名 悖离与回归——晚明士人美学态度的现代观照

著 者 张维昭

责任编辑 樊 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江苏省句容市春城镇南 邮编:212404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1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442-9

定 价 24.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1—87871135)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晚明士人美学态度生成的多重背景 (2)

 第二节 晚明士人美学态度的终极关怀 (24)

上篇 晚明士人的个体生命情怀及其哲学意蕴

第一章 感伤:唯我之暂存的困惑 (33)

 第一节 生命本体之“我” (34)

 第二节 生命文化之“我” (38)

第二章 颠狂:暂存之唯我的张扬 (48)

 第一节 晚明士人颠狂的心理依据 (48)

 第二节 晚明士人颠狂的表现途径 (53)

 第三节 晚明士人颠狂的文化模式 (59)

中篇 晚明士人自我实现的文化透视

第三章 晚明士人的趣境人生 (69)

 第一节 晚明士人追求趣境人生的的文化心理 (71)

 第二节 晚明士人趣境人生的审美类型 (74)

 第三节 晚明士人趣境人生的美学内涵 (80)

第四章 晚明士人的癖病心理	(85)
第一节 晚明士人的癖花情结	(89)
第二节 晚明士人的痴书情结	(107)
第三节 晚明士人的病酒情结	(125)
第四节 晚明士人的癖游情结	(138)

下篇 晚明士人尚情思潮的美学解读

第五章 晚明情学思潮的文化意蕴	(153)
第一节 晚明情之生成的文化背景	(154)
第二节 以“至情”为化境的情之内涵	(158)
第三节 以“冶情”为本的情之外延	(164)
第六章 晚明尚情思潮的审美理想	(169)
第一节 真:情美之灵魂	(169)
第二节 神:情美之气韵	(185)
第三节 豪情之美	(197)
第四节 怨毒之美	(208)
结语	(221)
第一节 晚明士人对儒学文化悖离的心理据点	(221)
第二节 晚明士人对儒学文化回归的美学模式	(227)
第三节 晚明士人美学态度在对儒学文化悖离与回归中的悲剧意识	(247)
参考文献	(256)
后 记	(268)

绪 论

晚明士人美学态度的建立是基于士人把日常生活态度转换为一种审美态度^①。在晚明士人的审美心理向度之下,任何生活中的对象都可以成为被审美对象。所谓“养德宜操琴,练智宜弹棋。遣情宜赋诗,辅气宜酌酒。解事宜读史,得意宜临书。静坐宜焚香,睡醒宜嚼茗。体物宜展画,适境宜按歌。阅候宜灌花,保形宜课药。隐心宜调鹤,孤况宜闻蛩。涉趣宜观鱼,忘机宜饲雀。幽寻宜藉草,澹味宜掬泉。独立宜望山,闲吟宜倚树。清谈宜剪烛,狂笑宜登台。逸兴宜投壶,结想宜欹枕。息缘宜闭户,探景宜携囊。爽

① “晚明”的历史时段自然有别于“明中期”、“明末”和“明清之际”,然而从文化气脉来看,“晚明士人”的概念已并非纯粹是历史时间性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载体。这一文化气脉在唐寅、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金圣叹、李渔等士人的身上贯注而下,由此,这一时期的很多士人都具有了某些共同的精神风貌与思想意识。因此,本文所涉及的士人,其生活的历史时段大致涵盖自武宗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正德(1506—1521)年间起,一直延续到明末安宗简皇帝朱由崧在位的弘光(1644—1645)年间、绍宗襄皇帝朱聿键在位的隆武(1645—1646)年间、永历皇帝朱由榔在位的永历(1647—1661)年间,这期间历经了世宗皇帝朱厚熜在位的嘉靖(1522—1566)年间、穆宗皇帝朱载垕在位的隆庆(1567—1572)年间、神宗皇帝朱翊钧在位的万历(1573—1620)年间、光宗皇帝朱常洛在位的泰昌(1620)年间、熹宗皇帝朱由校在位的天启(1621—1627)年间、思宗皇帝朱由检在位的崇祯(1628—1644)年间。

致宜临风，愁怀宜伫月。倦游宜听雨，玄悟宜对雪。辟寒宜映日，空累宜看云。寄欢宜拾钗，挥愤宜击剑。遭乱宜学道，卧病宜参禅。疗俗宜避人，破梦宜说鬼”^①。可见，生活中或庄或谑，或雅或俗，或喜或悲，或笑或骂，或醒或醉，或独或偶，或出或处，或见或闻，皆可妙机其美。

然而，这种对美的态度并不仅仅是士人群体审美能力的反映，它也是文化的趋动与再现。这使得晚明士人的审美态度负载着文化、历史、社会的某种深沉感。因此观照晚明士人美学态度的整体同一性，可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晚明士人美学态度生成的多重背景，二是晚明士人美学态度的终极关怀。

第一节 晚明士人美学态度生成的多重背景

美学态度是主体在特定审美心理向度之下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的稳定表现。而人对美的感受与理解从最初的模糊、随性趋向最终的稳定，这种审美态度的发生、发展甚或变迁一是缘于审美活动发生的社会文化土壤的孕育以及特定历史时期政治伦理的影响，二是缘于审美主体生命冲动的内在需求与选择。晚明士人美学态度的最终形成正是来自外宇宙的现实需要与来自内宇宙的自然需要两种契因的碰撞、交融与重构。

一

所谓来自外宇宙的现实需要，是指审美主体在现实社会中因种种阻碍、挫折而产生的痛苦感，迫切需求在审美中得到释放与调

^① 汤传楹《闲余笔话》，虫天子编，董乃斌等校点《中国香艳全书》（一），团结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0 页。

和。而这种释放与调和的实现是审美主体通过自我心理的调节，把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感知成某种和谐的东西，并在和谐中享受舒逸与自由的美感。

对于晚明士人来说，来自外宇宙的现实需要是士人审美态度形成的内在驱动力。晚明士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苦痛感主要源自三方面：一是黑暗停滞的政治给晚明士人带来的毁灭感；二是城市经济的发展给晚明士人带来的迷失感；三是明代心学思想给晚明士人带来的躁动感。

（一）黑暗停滞的政治给晚明士人带来的毁灭感。

明代政治的停滞不前与黑暗腐败，其实从武宗皇帝起已有险象环生的端倪。十五岁即位的武宗，本是天资聪慧，然而太监刘瑾引诱幼帝玩乐，致使武宗耽溺后宫。正德皇帝或于“燕闲之际，留心骑射，甚至群小杂沓径出掖门，游观苑囿，纵情逸乐”^①，或朝夕身处豹房，“不复入大内矣”^②。《皇明纪略》载正德己卯年“典刑坏乱，纪纲朝仪尽废，庙祀不修建，寺禁中路处妓女，玩弄边兵，身衣异服，至于市井屠贩下流贼贱靡不乐为。盖造行宫于宣府称为家里。东至永平诸处西极三边所过，掠民妇女，索取赎钱谷，逐谏臣以拒南游之阻。既夺指挥之妻称为马后，又纳山西所献娼妇呼为娘娘”^③。大学士梁储等曾进言曰：“伏望陛下念祖宗托付之重，体臣民瞻戴之情，自今以后，端拱穆清以保威重，节宣劳逸以顾天和；严内外出入之防，正堂阶尊卑之分；戒非时之宴游，屏无益之玩好。”^④武宗皇帝一生淫乐好玩，荒于政事，最终病死于豹房，死因缘于他逗留江南期间的肆意玩乐，据说是因为在江上打鱼，跌入江中而一

^① 《武宗实录》，夏原吉等编纂《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365页。

^② 同①。

^③ 皇甫录《皇明纪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据《历代小史》本影印，第28页。

^④ 同①，第2526页。

病不起。武宗没有子嗣，孝宗一脉从此结束。此后皇帝除泰昌帝即位一个月后离奇去世，崇祯皇帝因个人的敏感多疑，心浮气躁，目光短浅，刚愎自用，虚荣浅薄，少谋寡断而难逃亡国之君的厄运外，其他历任皇帝基本上都是步武宗后尘，荒废政事。嘉靖皇帝膜拜道教，宠信“青词宰相”，据《万历野获编》载：“世庙据西内醮，一时词臣以青词得宠眷者甚众，而最工巧、最称上帝意者，无如袁文荣炜、董尚书份，然皆谀佞不典之言。……时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盖门坛扁对，皆以金书，屑金为泥，凡数十碗，其操笔中书官预备大管，泚笔令满，故为不堪波画状，则袖之，又出一管，凡讫一对，或易数十管，则袖中金亦不下数十株矣。吾邑谈相辈，既以此得貳卿，且致富云。”^①同时，嘉靖皇帝为了修炼而大肆建造宫殿，以致国库极度空虚。嘉靖四年十月工部尚书赵璜等“以岁饥财匱，请暂停玉德殿、景福、安善二宫之工，候仁寿宫工完，财力有余徐议兴建。上不从，令办料完日一并兴工”^②。为炼丹长生，嘉靖皇帝还组织宫女清晨采露，最终导致“壬寅宫变”。然而长期服用丹药的结果，嘉靖皇帝不仅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且脾气日坏，以个人好恶动辄杀头或廷杖，朝廷大臣人人自危。穆宗皇帝虽然贞静、仁义，但也因忙于后宫好色淫乐而懒于政事。万历皇帝更是在1589年元旦之后，足足有二十五年没有走出寝宫，而官员们则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未见神宗皇帝的“票拟”和“朱批”。大臣在奏疏中对他的描述是“我皇自十七年以来，久不视朝，臣等先在朝列者，罕睹天颜。……当此民穷盜起兵革交侵之时，皇上不以为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杨万里校点，《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7页。

^② 《世宗实录》，夏原吉等编纂《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1352页。

意，夜饮无节，敲笞左右，死者颇多”^①。熹宗皇帝更是安享天乐，或沉醉木匠活，或临幸嫔妃，或游山玩水，始终无心过问政事。

晚明士人内心深层的毁灭感正是缘于帝王的懈怠政事。探析其毁灭感的表现途径，要之有二：

一是目睹纪纲大坏，心忧国事甚危。李梦阳在疏中曰：“计今事势，内官者腹心之病也。内官阴性而狼贪，其地逼近，又朋比难剪，故以为腹心之病矣。”^②赵南星在《敬循职掌剖露良心疏》指出当今大害有四：一曰干进之害。“夫人心公私，如参辰之不相并。富贵重则忠义轻，自然之势也。今举世竞进，不知止足”，致使“猥鄙者日进，淡退者日沉”。二曰倾危之害。“夫清班要秩，必须贤者。譬诸华苑灵圃，非蓄豕之所也。而群小妒贤，古今共愤。……近日小人益险，往往捏为无影之事，加之于人。或以去忌报怨，或以邀功取宠，鬼魅画行，良为可骇。至有自恃击援，公然排击善类，使贤士流落，而已亦不废通显，则鬼魅之雄者也”。三曰守令之害。“夫守令职在亲民，权亦得为。惟贤者为能乘权以利物，不肖者鲜不缘以自恣。今知县选授太轻，部寺之官，计日而升知府，曾不问其才行，科道出守，即为劣处，阘茸之徒，每见优容。……士人励行，如女子守身，淫即败俗，岂必久且甚哉。以故贪官充塞，无所顾忌，民安得不饥毙冗散也”。四曰乡官之害。“夫吏于土者，不过守令，而乡官之中，多大于守令者。是以乡官往往凌虐贫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则明辱暗害，无所不至”。天下惟除此四害，方可清仕路，疗民生，“然根本之地，实在皇上。夫惟皇上深居九重，不留意于国家之事，是以人得自行其私，无所顾忌……若圣心肯加励精图治，凡臣工之贤不肖，民生之利弊，一一而访问讲求之，知之若日月

^① 赵南星《味檗斋文集》(一)，商务出版社 1936 年据《畿辅丛书》本排印，第 27 页。

^② 张萱《西园闻见录》，台北华文书局 1970 版，第 7261 页。

之明，行之若雷霆之断，发之若江河之速，持之若金石之坚，大小臣工，谁敢干进，谁敢倾危，守令谁敢贪酷，乡官谁敢肆横”^①。因此，“天下之大纪纲也，振之自皇上始，必勤于听政，而后可以定国是；必慎于用人，而后可以振纪纲。……皇上深居不出，章奏之行止，推举之用否，天下方眩惑，而莫知其所繇，而何以定国是，振纪纲哉”^②。

二是日见世风颓不可挽，玩物陶情。严思庵《艳圃二则》载：“明万历之末，上倦于勤，不坐朝，不阅掌奏，辇下诸公亦泄泄沓沓然，间有陶情花柳者。一时教坊妇女，竞尚容色，投时好以博赀财。”^③黄汝亨《四川按察司佥事沈公行状》载：“今皇帝七年也，公自起京名进士，既为御史，贵不获展，退而林间，日事灌园课子为娱，间以暇为泉石诗酒管弦之乐。所遭名山水及当海以内，韵士墨客与之登眺，杯觞高谭，清咏霏霏不倦。”^④如屠长卿“少负不羁，以文章自豪……志业不遂，仍以豪罢。归而益注其才情于著作之林，几于弇州新都辈争流竞爽，晚乃棲心于禅玄二氏，又欲综三教之旨于一毫端，时出而为竺乾，为柱下，为洙泗，霏霏乎落笔为花，流沫为珠，玄黄黼黻，其辞以自愉快”^⑤。可见，士人或花月酣沉，或哀丝豪竹，或焚香看书，或林园觞咏……其所为种种，皆于道途寂寞中各宣其愤其傲而已。

（二）城市经济的发展给晚明士人带来的迷失感。

明代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自明中叶以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

① 赵南星《味檗斋文集》（一），商务出版社1936年版，第26,27页。

② 同①，第8页。

③ 虫天子编，董乃斌等校点《中国香艳全书》（一），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④ 黄汝亨《寓林集》，明天启四年吴敬等刻本，《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4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页。

⑤ 同④，第60页。

种变化之巨大可以从世风之奢靡僭越中以窥斑见豹。

晚明风俗奢僭实始自朝廷。如武宗皇帝，即屡以游戏燕乐鹰犬玩好等无益之费、无名之赏，大肆挥霍国库。《万历野获编》载：“武宗朝宠任伶人臧贤，至赐一品服，然虽萦蟒玉，而承应如故也。”^①《明实录》载正德元年令内官监左少监崔果等往应天府制造彩妆缎匹。工部尚书曾鑒等奏曰：“彩妆缎一匹，用数十人之工，逾半年而后可完。分外所费，尤难悉数。窃惟服以彰德，赏以酬劳。赏之有节，则得之者宝藏珍重以为奇。滥则亦以寻常视之耳。伏望躬行节俭，裁抑赐予。或有应赏人员，止用织锦缎匹。”然而皇帝“弗听”^②。嘉靖帝亦是不顾灾伤穷民，在百姓“幼男稚女，称斤而卖”之际，加派织造，大臣以“道路传闻，镇守太监梁瑤遣人挟货营管织造”上疏，嘉靖帝手批答曰：“织造自是累朝事例。矧两宫是用及朕常用袍服，一切缺乏。官业已差，及撰写敕来，无具扰执拗”^③。此外，如万历年间，吕坤曾疏言：“洮、兰之间，小民织造货贩以糊口。自传造以来，百姓苦于催逼，弃桑农而捻线者数百万人，提花染色，日无休息。至于山西之绸，苏、松之纱、罗、缎、绢，岁额已自日盈，与其积于无用，孰若定以有常……”然而“疏入，不报”^④。又如天启年间，尚衣监太监高洪以兼直婚丧典礼应用丝料最多，乞下工部查例买办，串五细丝八万七千斤、黄白长荒丝六万五千斤；并加添典礼军需应用串五细丝、黄白长荒丝各三万斤，以备不时支用。部科查参，言：“须知内款开该监细荒二丝，四年一买，所买不过二万五千斤。间或遇缺，召买大略岁不过五千两。查万历三十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杨万里校点，《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1页。

^② 《武宗实录》，夏原吉等编纂《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481页。

^③ 《世宗实录》，同②，第871页。

^④ 《神宗实录》，同②，第5777页。

五年丝价十万余两，分三次办选，计十万，合供二十年之用，须五年后方可题办。今遇婚丧大典，始将该库所题量办四分之一，以济急需。其加添丝料仍于前数内支用，每年总不过五十。不必别立名色，为日后援此口实。”奉旨：“仍着照数召买，分运解进，不得议减。”^①

皇帝之节俭不行，奢华不抑，使得整个社会在拜金思潮的引领之下，一方面奢僭之风屡禁不止，另一方面贪风不止，民怨日深。

首先是拜金思潮引领之下的奢僭之风屡禁不止。如有史料载明仕宦僭越之甚：“鄢懋卿恃严嵩之势，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其按部尝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张居正奉旨归葬，藩臬以上皆跪迎，巡方御史为之前驱。真定守钱普创为坐舆，前轩后室，旁有两庑，各立一童子给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过牙盘上食，味逾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普无锡人，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始得一饱。’于是吴人之能庖者，召募殆尽。”^②又如张岱在《越俗扫墓》中提及：“越俗扫墓，男女炫服靓装，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幙船，男女分两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后渐华靡，虽监门小户，男女必用两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鬯饮。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游庵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园。鼓吹近城必吹《海东青》、《独行千里》，锣鼓错杂。”^③再如沈德符于《万历野获编》载：“江陵时，岭南仕宦有媚事之者，制寿幛贺轴，俱织成青罽为地，朱罽为寿字，以天鹅绒为之。当时以为怪，今则寻常甚矣。今藩府贺其按抚，将领贺其监司，俱以法锦刺绣文字，在在皆然，价亦不甚

① 《熹宗实录》，夏原吉等编纂《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 949 页。

②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784 页。

③ 张岱《陶庵梦忆》，西湖书社 1982 年版，第 8 页。

夐，盖习以成俗也。又近年有一御吏按江南，邑令辈织成双金刻丝花鸟人物，冒之溲器之上，御史安然享之。”^①

其次是拜金思潮的引领又使贪风不止，民怨日深。民怨之深一是缘于民不堪扰。如就采木言之，“丈八之围，非百年之物。或孤生仞崖，或丛长千里，毒雾常浓，人烟绝少，寒暑饥渴，瘟疫瘴疠而死者无论矣。乃一木砍卧，千夫难移，每行不过数步，遭险跌伤死者常至百人。至于磕撞之处，岂无伤痕”^②。又如就织缎而言，“样缎动以数千，带造多逾本数。稍不称意，辄遭毁裂。故有变产鬻子抵赔者”^③。二是缘于官吏竞贪成风。所谓“贪墨之吏，搜括公帑以充之。搜括必加渔猎，渔猎必加科派，科派必加箠楚……查浙江、苏州等处，拖欠应进京库金花银共计一百六十余万两。又查各抚按赃罚银两，有二三年全不解部者”。甚至这种侵贪之风已严重影响了国富兵强。黄汝亨在《兵饷》中提到：“士耽于惰，而将驰于贪；及有事，急不可他遣，其惰其贪者势皆弗可用时，又不足行简阅法，而其贪与惰者卒不可用，势不得不招募。招募则饷益以增而国用益不给，此必然之数也。今天下陆海川泽之藏与输粟赎罪，一切之法，无一不纳之县官，而民之脂膏亦复腹且削，势必不可复加赋。”^④然一旦逢灾荒之年，海内之民，家家悬罄，饿殍填壑，流冗载路。于是“千百成群，起而为盗”，凤阳、泗州、洪泽就曾饥民啸聚首，“不下二千余人，劫掠过客商船，无敢谁何”^⑤。然究盗贼滋炽之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杨万里校点，《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0页。

^② 《神宗实录》，夏原吉等编纂《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5778页。

^③ 《世宗实录》，同②，第864页。

^④ 黄汝亨《寓林集》，《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4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页。

^⑤ 《世宗实录》，同②，第869页。

因,将吏之贪惰侵牟实难咎其责。

在奢僭成习、贪鄙成风的晚明社会,晚明士人的迷失感正是源自于“利”字前的矛盾心理:一是好利而俗乱,一是恶利而贫窘。

一方面是好利心理。晚明社会好奇货,好玩物,身处“士鲜衣美食、浮淡怪说、玩日愒时,而以农工为村鄙;女傅粉簪花、冶容学态、袖手而游,而以勤俭为羞辱;官盛从丰供、繁文缛节、奔逐世态,而以教养为迂腐”^①的晚明社会,耻贫爱富,好利之心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张大复于《贫人不乐》曰:“人不得乐,则必感慨于所处之地,纵不怨天,亦须自怨,故曰贫而无怨难。贫人不能行其念,而自谓于心无怨者,吾罕见矣。”^②袁中郎谓孔子亦曰“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由此可见“爱富贵如此之急,而辞爵禄如此之难”,因此坦承“弟亦何人,欲作孔子以上人耶”^③。袁小修更是“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④。李贽《答邓明府》则直言“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⑤。郑瑄于《昨非庵日纂》借岳武穆言曰:“文臣不爱钱,天下太平。”^⑥可见,“财者人之命。放利之人,其视世之所有,皆其命也。夫使人捐其命以全人情,存天理,其必以为不诚不情之极矣”^⑦。然好利奢侈

① 吕坤《呻吟语》,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26 页。

②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明清娱情小品撷珍》,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6 页。

③ 《答吴本如仪部》,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63 页。

④ 《叙袁小修诗》,同③,第 188 页。

⑤ 李贽《焚书》,《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 140 册,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95 页。

⑥ 江畜经编《历代小说笔记选》(金元明),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16 页。

⑦ 张大复《放利》,同②,第 260 页。

亦不无隐忧，所谓“夫俗奢必荡，荡则穷；民泰必骄，骄则僭。民穷而僭，乱丛生焉。司世道者，不能无隐忧矣”^①。薄俗不革，淳风难还，因此好利而虑俗乱是晚明士人的第一重矛盾心理。

另一方面是恶利心理。清为贫，富则浊。所谓“士不贪犹女不淫。……一旦担爵食禄，备冠绅之列，处膏润之地，见欲则乱，见利则昏。乃迁素毁质，与汨俱没，内浊志意，外溷鄙俗。甚者，荧惑主心，浚削黔首，流秽扇毒，贻宗社之祸，遗臭千载。于是独醒独清之人砥行于礼义廉耻而棲志于澹泊凝静、皎然尘埃之表，澄汰末流纲纪，人世故尚”^②。在“钱布薰心之场”，“节傲峨眉绝顶冰，溽暑不销，一片严凝透骨。品高昆冈千仞玉，纤埃弗染，连城温润无暇”者为“冰操”之士^③；“炫虚名，渔实利，而内存狡狯之心，阴为鸟兽之行者实乃盗贼也”^④。可见，晚明士人澡身履洁者大都不愿以身名之皎皎，就浊世之溷溷。

晚明士人好利与恶利的矛盾心理，使士人陷入二律背反的矛盾中，正如时人言：“富贵大是能俗人之物，使吾辈当之，自可不俗。然有此不俗胸襟，自可不富贵矣。”^⑤好利必身厕溷浊，恶俗则必不衫不袖，啜茶以供冷腹，因此，好利与恶利的两难境界使晚明士人有种择取无从的迷失感。

（三）明代心学思想给晚明士人带来的躁动感。

这里所谓的“心学”是与“理学”相对意义上的名称。理学家尽管也用“心”一词，提出所谓“心统性情”，认为心具有性与情两个层面，其中性是体，情是用。因为性是至善的，是纯然合乎客观的天

^① 黄汝亨《廉吏传序》，《四库禁毁丛书》集部第140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② 黄汝亨《寓林集》，同①，第43页。

^③ 江畜经编《历代小说笔记选》（金元明），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④ 吕坤《呻吟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

^⑤ 晚明士人清言所尚，陈继儒《小窗幽记》、陆绍珩《醉古堂剑扫》等均有载。

理,而情则可能有善有恶,未必与天理尽合。因此,性即理。

较之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心学思想从某种角度讲则是追求生命情趣与生活日用的雅俗并致思想。这种心学思想大致起源于陆、王“心即理”思想的提出。王阳明是从“心外无物,心外无事”推出“心外无理,心外无善”,进而得出心即理的结论。认为心可依据其“性”规定事物理则的活动,尽管王阳明本意还是要恪守“存天理”,但其对灵明之心的主观能动之认可,对自然主义的包容,实起阐发后学之功。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心斋即发挥阳明之“乐是心之本体”,大倡《乐学歌》,所谓“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 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①。心斋不仅要“乐心”,而且要“尊身”,“圣人以道济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者身也。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故学也者,所以学为师也,学为长也,学为君也。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舍此皆妾妇之道”^②。此后的狂禅先驱如颜山农倡曰:“人心妙万物而不测者也。性如明珠,原无尘染。有何睹闻? 着何戒慎? 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③何心隐则是从“心”出发,反对无欲,所谓“孔子之言无欲,非濂溪之言无欲也。欲惟寡则心存,而心不能以无欲也。欲鱼欲熊掌,欲也;舍鱼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义,欲也;舍生而取义,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 得仁而不贪,非寡欲乎? 从心所欲,非欲乎? 欲不逾矩,非寡欲乎”,因此,“无欲则无心”。罗近溪更是认为“人之为生,自有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台湾明文书局 1991 年版,第 709 页。

② 同①。

③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同①,第 703 页